



陶行知一生

PDG

总 序

1529/109

陶行知先生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人们一直在怀念他，以各种方式纪念他，整理出版他的遗著，研究探讨他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一生，正值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忧，为中华民族谋取解放，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怀着“文化为公”、“爱满天下”的胸襟和“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为整个民族的利益来造就人才”，三十年如一日，百折不挠。他的爱国情操、革命斗志和创业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

陶行知在他的革命和教育实践中，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善于借鉴而不是仪型他国，遵循他自己归纳的“行(实践)——知(认识)——行(实践)”的辩证法，总结和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为中国所用的教育思想。例如，他认为，发展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要求乡村教师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要“用最少的钱办理最好的教育”，要“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他对教死书读死书的旧教育深恶痛绝，提倡并实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的“生活教育”学说，使三百六十行人人受教育，德智体美技五育齐发展。他鼓励教育工作者做“第一流的教育家”，“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发的边疆”，并躬行实践，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

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各种类型的新型学校，成绩卓著，誉满中外。

陶行知教育思想，对于今天开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新局面，诸如如何尽快地在十亿人口中扫除尚存的两亿三千多万文盲和半文盲，如何多快好省地普及教育，如何使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如何培养众多的德才兼备、手脑并用的各种建设人才，等等，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1981年10月18日，邓颖超同志在纪念陶行知先生九十诞辰大会的开幕词中，号召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他（指陶行知——编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全国已有十个省市先后建立或正在筹建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在整理出版陶行知遗著、交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成果、总结推广陶行知为人民办教育的成功经验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国外，如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等，也有一些人在研究陶行知。

为了满足人们对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认识和研究的需要，湖南教育出版社在委托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辑《陶行知全集》的同时，委托安徽、江苏和北京三省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从人们对陶行知的回忆录、纪念集和研究论丛中选择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分别汇编成《陶行知一生》、《纪念陶行知》和《陶行知研究》三部文集，交付出版。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读者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了解和研究，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开创，有助于中国自己的教育科学的建立，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三部书内容虽各有侧重，旨趣则同，故合为总序。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年3月1日

前 言

陶行知先生(1891—1946)，安徽歙县人。毕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与教育事业，公认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卓越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乐于接受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委托，为读者编辑《陶行知一生》这部文集。文集收入介绍陶行知生平事略的文章共51篇，是从近几年来本会会刊《行知研究》及其他报刊上选来，作者包括行知先生的亲友、学生、同事、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这部书虽然不是行知先生的传略，却由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陶行知革命的一生，有助于读者了解陶行知和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奋斗历程，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反映陶行知爱国亲民思想的形成，积极支持“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勇敢站在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前列的动人事迹；

第二部分，“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介绍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的教育实践，他的“生活教育”学说的形成及其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具体运用。

第三部分，“爱满天下”。反映陶行知桃李满天下，遗爱在人间，不愧为“万世师表”。

陶行知一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走什么路、为谁服务的光辉榜样。他的一生，对于我国的年轻一代，仍然具有激人奋进的鼓舞力量。

本书经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集体研究选材，由姚新吾同志负责编辑，丁丁同志审定。本书图片大部分由上海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杨明远同志提供，封面及辑封木刻，均由陶行知的学生、中央美术学院伍必端副教授刻制。本书编辑过程中，还得到所收文章的作者和其他同志的协助，一并致谢。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

1983年10月



为一大事来 做一大事去

目 录

为一大事来 做一大事去

追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张劲夫 (1)
回忆陶行知先生三件事·····	戴伯韬 (11)
尽瘁民主事业直至最后一息·····	吴树琴 (15)
陶行知的青少年时代·····	姚新吾 (25)
我所知道的陶行知·····	张国良 (33)
“五四”运动时期的陶行知·····	王 琳 (40)
平民教育运动中的陶行知·····	刘 琪 (43)
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奔走·····	王 克 (56)
二十六国行——爱国主义一曲凯歌·····	杨明远 (62)
令人兴奋的报告·····	韬 奋 (85)
陶行知在香港·····	卢玮銮 (91)
武汉之行·····	夏德清 (100)
学习陶行知的高尚品德·····	晓 肇 (105)

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

“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	王 琳 (115)
峥嵘岁月 晓庄巡礼·····	许士骐 (120)
在陶先生的熏陶下·····	易铁夫 (123)

回忆晓庄·····	夏孟文 (130)
生活教育实例五则·····	严 钝 (136)
晓庄师范生活片断·····	李相维 (143)
联村自卫团·····	邵仲香 (148)
忆晓庄 念陶师·····	陈鸿韬 (154)
陶行知与儿童自动学校·····	胡同炳 (169)
前进中的晓庄师范·····	汤翠英 (183)
陶行知与安徽教育二三事·····	朱泽甫 (195)
“科学下嫁”·····	郭以实 (201)
陶行知和工人教育·····	金立人 (216)
陶行知和女工读书班·····	朱冰如 (219)
陶行知先生和报童·····	申广圣 (223)
山海工学团诞生前后·····	朱泽甫 (227)
党在白区教育的一个据点·····	张 健 (235)
山海工学团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俞文华 (240)
回忆晨更工学团·····	徐明清 (244)
回忆萧场工学团·····	徐祥先 (250)
继续战斗在“山海”·····	杨明远 (254)
陶太老师和新安旅行团·····	李楠 韩枫 (268)
育才学校的新教育·····	丁 华 (277)
育才学校·····	〔英〕陶露西·尼达姆 (288)
记古圣寺·····	蔺伯赞 (291)
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在育才·····	丁右涵 (295)
培育人才幼苗的新路·····	王传义 (299)
忆皖南亭变后育才学校生活·····	丁右涵 (305)
社会大学的实践·····	金成林 (313)

爱满天下

他在我心中布下科普创作的种子.....	高士其 (321)
爱满天下的陶夫子.....	廖意林 (330)
轶事四则.....	戴自俺 (334)
高大的身影.....	高 缨 (347)
大哉陶子.....	张达扬 (360)
遗爱在人间.....	周 毅 (369)
上海大场农民怀念陶行知.....	孟根根 (375)
他们都是热爱陶行知先生的人.....	刘大康 (382)
四海同悲.....	一德 新吾 (387)

追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张劲夫

我对陶行知先生是很怀念的，因为他是我一直尊敬的老师，我从他身上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为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为一位教育家，他的事迹、学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对于当前实现“四化”目标，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可以吸收其中许多可取的见解和方法，是很有现实积极意义的。抗日战争前后，解放战争时期，在民主进步人士当中，他应该属于邹韬奋那样的左派人物。

一九三〇年我进了他办的晓庄学校，这个学校是陶先生靠募捐办起来的。因为他本人当时流亡在上海，我在晓庄学校期间并没有见到过陶先生。

那时候，学校里有国民党、国家主义派，共产党员也很多，很活跃。后来学校被国民党封闭了，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有十四位同学被杀害在南京的雨花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前，陶先生在上海化名写文章，他与史量才有点关系，经常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编成了两本书，一本是《斋夫自由谈》，一本是《古庙敲钟录》。

他还创办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他提倡儿童从幼年就开始培养喜爱科学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玩“科

学把戏”，引起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后来，他以主要精力办了一些“工学团”。主要是在工人区、郊区农村招收农民和工人的子弟，还有一些城市贫民的子弟。学生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团，就是团结、联合的意思。

工学团办在几个地方，其中比较大的一个是在上海市与宝山县之间的大场，名字也就叫做“山海工学团”。当时是马侣贤同志主办的，他是晓庄学校第一期的学生。在上海的北新泾也为工人农民子弟办了一个工学团，叫做“晨更工学团”。这个工学团是徐明清同志主办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后，我参加了学生救国运动，对南京政府所作所为很不满意，就写了一封信给陶先生，要求到上海去工作。经他介绍，我便到了山海工学团当教师。我是一九三二年冬天去的，直到一九三七年，后来还担任了团长，即校长。

“一二·九”运动以后，上海成立了救国会，教育界也成立了国难教育社，陶先生担任了理事长，他也是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总会的负责人。他积极参加救国运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他出国了。到英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以后又到法国、美国、加拿大、印度等欧、美、亚、非二十六个国家去宣传抗日。一九三八年回国后就到重庆去了。这时，我已参加新四军，到抗日前线去了。我们也就没有再见过面。

从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六年秋这四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和陶先生有不少接触。他是搞教育的，后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一生办的教育事业很多，也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我所知道的有限，从我和他接触中所得的印象，对陶先生的看法是这样的：

他开始搞的是“教育改造”，曾出版一本书《中国教育改造》，

想以“教育革命”来配合“国民革命”。他曾谈过“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能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他在二十年代是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是赞成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的。他说：“什么是真三民主义呢？真的三民主义只有一本，只有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一本，其余什么人解释的都是假的，都是靠不住的。”但他着重点是放在教育改造上，放在“教育革命”上，按照他的改造主张努力从事教育，以此报国。他在一九二三年奔走提倡平民教育时就说过：“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的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可见陶先生在二十年代，能够提出以“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而他对“政治革命”的理解，明确提出赞成“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是进步的，这和有些“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是有区别的。我以往未能看到二十年代陶先生的言论文稿，最近才看到二十年代陶先生的部分言论文稿，使我了解到陶先生在二十年代即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思想。由于陶先生在二十年代即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到他搞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他从事教育的对象，他鲜明地提出要为劳动人民，按他的语言就是搞“平民教育”，搞《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描绘的“农民教育”。在他出国学习期间，尤其是到了上海以后，认识到工人重要，把农民、工人、城市贫民统称为“劳苦大众”。他办学校、办事业都是为了“劳苦大众”及其孩子们，他在实际上做到面向工农，包括城市贫民和他们的孩子们。现在教育工会的方明同志，就是当年陶先生组织的“卖报儿童工学团”的团长。

二是他提倡的教育方法与当时的教育方法不同。他认为当时教育方法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是脱离中国实际，没有多大用的。他强调联系实际，“教学做合一”，读活书，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倡即知即传人，反对知识私有的“守知奴”，这是很有创见的。开始，他是赞成知行合一的，先头他的名字就叫知行，后来他认为应该实践在前，“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知”是经过“行”才得出来的，所以他便改名为行知。这反映了他在哲学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

第三个特点是他有高度的事业精神，他是有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是贫苦的家庭出身，本人也是依靠奖学金学习的，这和他具有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弟多受教育而努力的观点有关。在他的学生中，也是贫苦人民出身的多，赞成他的教育观点的学生也是贫苦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多一些。当然，其中也有不好的学生，但大多数是进步青年。后来他的不少学生成了我们党的同志，还有的成了我们党的高级干部。

他的生活一直是非常艰苦朴素的。在上海时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靠稿费。他在上海报纸上登过“卖艺”广告，以写字、演讲、卖文为生。办学校、办事业就靠到处募捐。在上海工人区办的工人夜校，陶先生经常去作演讲，和工人接触。陶先生每周都下乡到山海工学团，有时直接和农民谈心，和农民小孩接触时，更是有说有笑，充满着感情。他具有为劳动人民办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有一副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符合实际情况，说的并不过分。

他还具有学术民主作风。不同的意见可以听得进去，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都能听进去。这也是他以后能不断向进步方

面发展的一个因素。

象这样一位人民教育家，教育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弟，教育方法又是这样的注重读活书，注重实践，这就使他能够接触广大的人民群众，接触当时的社会实际，因此也就使他容易接受进步的东西，容易接近进步的组织和接受进步思想，这就不同于一般的“洋学生”了。在当时出国留过学的人们中间，象他这样是少有的。

到了三十年代，“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发生，陶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后，党的“八一”宣言传到了上海，陶先生积极响应。加上他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经常和他联系，陶先生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和邹韬奋一样的进步领导人物。

他在上海时期，每年三月十五日（晓庄学校开学日）都作为“生活教育”纪念日，举行集会纪念，进行座谈。记得当时地下党有些同志受到“左”的影响，每次座谈都指出：“生活教育”的生活内容是什么，离不开政治，希望他正视反动政府倒行逆施的现实，不能视而不见，空谈什么离开当前政治的生活教育。对此他总是含笑而听，深沉地思考。其实陶先生不仅在当时，即在之前，就不是脱离政治的，一直是在以“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的。只是陶先生有他自己的语言，他重视讲真话，办真事，不赞成“左”的空谈和行动。虽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是不正视现实政治的。“一二·九”后，陶先生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就明确宣布，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积极提倡推行国难教育，组织国难教育社。

在他出国以前，我们谈过话。虽然他自己没有正式提出参加党的要求，但明确表示支持我们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说明他对党

是拥护、支持的。在上海他所主持的单位里，地下党是占了领导地位的，成了我们党的重要活动据点。

由于他不断进步，逐渐认识到中国要独立富强，主要问题在于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他与胡适是同乡，早年也是要好的朋友。在一九三〇年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后，胡适要陶先生断绝与追随他的学生来往，陶先生即断然与胡适分道扬镳。陶先生并对胡适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曾作诗嘲弄他捉了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帝国主义）。

由于政治上的进步，也就影响了他的教育观点。他刚从美国回来时是赞成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后来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了。陶先生虽然一直在用“生活教育”这个口号，但内容已经加了不少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东西了。

他留学回国后不久，就与旧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同情劳动者，反对不劳而获。他有不少诗歌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感情，如批评有些人“只为阔老烧大菜，且听穷人吃糟糠。”“不做事，要吃饭，什么人？是混蛋。做坏事，吃好饭，什么人？忘八蛋”等等，等等。他早年丧妻，到四十多岁要续娶，在《爱的播音》这首诗中说：“大众在左厢，小孩坐中央，你若不篡位，万事好商量。”这足可说明他对劳动人民及其孩子们的感情是很深的。但他对劳动人民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的，开始时期，他是把自己摆在劳动人民的同情者、帮助者的地位上。由于他能真诚同情劳动人民，接近劳动人民，并能身体力行，以后就进一步发展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了。我认为把陶先生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总的来讲，陶先生是由“教育革命”配合“政治革命”来救

中国，进步到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运动。他在思想上的进步倾向是日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他不仅在学习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学习唯物史观，而且在行动上体现了损己利人的高尚品德，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信仰共产主义。回想许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从爱国、救国出发，发展到为共产主义奋斗，有的成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有的参加了党的组织。其中有的走得快些，有的走得慢些，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提高的过程、改造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陶先生一生的活动来看，他原先是以“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后来就直接参加抗日救国、民主运动，做了许多工作。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他的行动、言论具有他自己的特点。如他办教育，不靠国民党政府，采取民间办学的形式。虽然他与一些官方人员和民族资本家们有一些关系，但从不靠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力量，只是利用民间力量，靠募捐。陶先生本人对国民党、蒋介石是不满意的。在上海的各救国、民主进步团体中，他曾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通缉的对象。他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是有很大大影响的进步民主运动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对他的思想、言论、活动等，要作全面评价，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实事求是进行分析的：

一是他和杜威的关系。他在美国上学时杜威是他的老师，杜威本人是资产阶级民本主义者，是实用主义者，提倡“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陶先生开始是受到一定影响的。回国后一度也提倡过这个教育观点，所以有些人认为他是杜威的门徒。我认为他早期确实受过杜威的影响，但他回到中国之后，尤其是到了人民群众之中以后，就逐渐改变了观点。杜威在政治上是维护资本